

古汉语知识丛书

怎样学习《说文解字》

章季涛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古汉语知识丛书
怎样学习《说文解字》

章季涛 著

责任编辑 刘一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 7.125 印张 141 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ISBN 7-215-00250-0/H·12

定价1.2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具体论述《说文解字》的性质、内容、立论依据、释义方式以及六书类例、编排体例等。著者征引很多前人成说，有时又能提出自己的创见；对于《说文解字》的重要注家作了详细介绍，并予以公允评价。它是为初学《说文解字》指示途径而编著的，剖析原书条理清晰，行文力求通俗平易。

序

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是我国语文学中一部极为重要的著作。它“櫛括有条例，剖析穷根源”。它为汉语字典创立了部首，用五百四十部统摄当时所有的汉字，并逐字解释其形、音、义，把文字、声韵、训诂熔于一炉。它还广引群书，以证明其说信而有微；博采通人，以保存其可资参考的异说。我们今天要通晓古代汉语，整理古代文献，继承文化遗产，都不可不读此书。可是此书文字简古，很不容易读懂。加以它的各种体例都散在说解中，也难于领会。从前的语文学家虽然作过不少的注解、释例，也多半艰深古奥，不是初学者所能理解的。

章季涛同志为此花了许多时间，来撰写这部名为《怎样学习〈说文解字〉》的新著，以补前贤的不足，而为初学《说文》者指示途径。其书遣词用语力求通俗，而剖析许说条理清晰，极便阅读。可以说是一种普及读物，但又兼具较高的学术价值。它的学术价值首先在于它对《说文》的性质、内容、释义方式、立论依据以及部首编排、六书类例等，都有深刻的分析。虽然颇引前人成说，却也时有创见，如对假借和转注的解释、转注和语根的关系、转注字产生的原因等，

就有不少新意。其次，它的学术价值又在于持论比较公允，如对许书的优点既给予充分的肯定，也往往指出它的瑕疵。既推重《说文》，也不贬低金甲之学。再者，书中除评论《说文》以外，还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说文》的几个重要注家，并且也能公允地给以评价。这对初学《说文》者很有用处，也是值得肯定的。书末附录《说文叙注》和《说文疑难部首解析》，也有益于读者。

读了季涛同志的这本新著，我感到非常高兴，同时也把着很大的希望：希望他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希望不久能读到他的另一本新著。

周大璞一九八三年三月于武汉大学

目 录

序	周大璞 (1)
---------	-----------

第一章 《说文解字》的编写	(1)
---------------------	-------

第一节 作者许慎	(1)
----------------	-------

第二节 编写意图	(5)
----------------	-------

第三节 持说立论的依据	(10)
-------------------	--------

第四节 《说文》的意义和影响	(15)
----------------------	--------

第二章 《说文解字》的内容和特点	(22)
------------------------	--------

第一节 析形释义, 兼及音读	(22)
----------------------	--------

第二节 “文”和“字”的区别	(29)
----------------------	--------

第三节 “六书”的体系	(32)
-------------------	--------

第三章 《说文解字》的说解方式	(48)
-----------------------	--------

第一节 说解字形的用语	(48)
-------------------	--------

第二节 《说文》释义(上)——义训	(58)
-------------------------	--------

第三节 《说文》释义(下)——声训	(64)
-------------------------	--------

第四节 《说文》的注音方法	(69)
---------------------	--------

第四章 《说文解字》的编排体例	(76)
-----------------------	--------

第一节 创立部首, 编排字头	(76)
----------------------	--------

第二节 部首的排列	(84)
-----------------	--------

第三节	立部的缺点及影响	(88)
第四节	关于重文	(92)
第五节	关于古文字	(95)
第五章	学习《说文解字》的态度和方法	(100)
第一节	钻研原著，细读精思	(100)
第二节	不可尽信《说文》	(103)
第三节	贵能玩索白文	(109)
第四节	须知字素活用	(112)
第六章	《说文解字》的主要注家	(119)
第一节	清代以前的重要注家	(119)
第二节	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	(128)
第三节	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	(140)
第四节	王筠的《说文释例》及其它	(144)
第五节	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	(152)
附录一：	《说文解字》疑难部首解说	(160)
附录二：	《说文叙》注译	(202)

第一章 《说文解字》的编写

第一节 作者许慎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不朽名著。它的作者许慎，是东汉中期人。《后汉书·儒林传》对他记载如下：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城县）人也。性淳笃，少博学经籍，马融常推敬之，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浚（读xiáo，县名）长，卒于家。

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皆传于世。

这段记述比较简略。下面以职位品级为序，结合其它材料，说说许慎的生平事迹。

许慎的从政活动，是从做“郡功曹”开始的。那时他还年轻。“郡功曹”是州郡长官的属员，管理文书、考课，地位低微，说不上有什么品级。许慎在做“郡功曹”的时候，逢着皇帝下诏推举“孝廉”。由于他“性淳笃”，就被地方长官举为“孝廉”，荐给了中央。

许慎到中央之后做过什么，史书没有记载。马叙伦先生对这段历史作过一些考证，认为许慎到京城之后，最先得到的是“王国郎”这个品级。“许君自郡功曹举孝廉，因至京师，得从贾逵受古学，遂拜为王国郎，仍留京师。”（《说文解字研究法》第120页）许慎的儿子许冲曾在《上‘说文解字’表》（以下简称《表》。表，是给皇帝的奏疏）里说，许慎是贾逵的学生，“从逵受古学”。贾逵奉诏招收学生，传授《左传》《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书，是在汉章帝八年（公元83年）。马叙伦先生认为，许慎拜贾逵为师就在这一年。汉章帝对贾逵收徒非常重视，为了表示皇家的恩宠，贾逵的门弟子都拜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后汉书·贾逵传》）“王国郎”品级很小，论俸禄是“中二百石”（石，是计算俸禄谷米的单位）。具有这个品级的人，通常是中央各部的秘书。

许慎在京城里得到的第二个职位，是做“太尉祭酒”。这是个正式的官衔。“太尉祭酒”的全称是“太尉南阁祭酒”（见许冲的《表》）。祭酒，本是宴飨时酹酒祭神的长者，用作官名，意味着是“诸曹之长”（在僚属中为首）。这个职位比“王国郎”高。论俸禄“比四百石”（比，相当），是太尉府里的秘书长。太尉，在汉朝与丞相同列。《汉官仪》说，那时选拔人才设有四科。第一科是从“德行高妙，志洁清白”方面选拔人才。得中第一科的人“补西曹南阁祭酒”。许慎得为“太尉祭酒”，自然是这一科出身的人。许慎对这个官职深感荣耀，所以他以“太尉祭酒”题署

《说文》。

许慎在京城里得到的第三个职位，是做“五经博士”。《后汉书·安帝纪》说，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命“五经博士，校定东观五经、诸子、传记、百家艺术”。许冲在《表》里说：“慎前以诏书校东观。”说明他父亲参与了这件盛事。参与校书的人既然是“五经博士”，许慎当然有这个职位。何况他还被人夸奖为“五经无双”呢？博士衔又比“太尉祭酒”高，论俸禄是“六百石”（见《后汉书·和帝纪》七年注）。

许慎在京城里做过的第四件事情，是教小太监读书识字。许冲在《表》里，说他父亲“教小黄门孟生、李喜等”（黄门，是皇帝内宫的禁门。汉殇帝时，充当小黄门的太監定员是二十人）。教书本是“五经博士”份内的事情，因为汉武帝设置这个官爵的目的，就是要他们传授古代文化，特别是传授儒家典籍。派许慎去教小黄门读书识字，虽说不是份外，但却表明许慎当时年事已高，已被闲置了。他作此事时，是在京城至少生活了二十八年之后（见下文的计算）。太監们生活在禁宫，知道皇家私事，做他们的老师，从常情上说，非得年高持重之人不可。但仅仅教二十个小太監读书识字，显然不属大事。许慎读书一生，道德学问虽然受人赞许，但始终未获得高官显爵。

许慎在京城的生活时间是很长的。前文说过，从汉章帝八年（公元83年）贾逵奉诏收徒，到汉安帝永初四年（公元110年）诏命五经博士校书东观，其间二十八年，许慎都在

京城。把这段时间前后稍作延伸，他在京生活时间总在三十年以上。

许慎晚年被派做县官。《后汉书》说：“再迁除洺长，卒于家。”（洺xiáo，汉县名，在今安徽灵璧县境内。长：县官。汉制万户以上的县，县官叫“令”；万户以下的县，县官称“长”）“再迁”，适用于已有爵禄的人调任新职。许慎得到爵禄是在京生活期间。所以“再迁除洺长”，必定在许慎在京生活之后。《后汉书》说这是升迁，实际上却是许慎晚年被闲置的继续。从俸禄上说，小县官的俸禄是“五百石至三百石”（见《汉书·百官公卿表》），比起博士来至少少了“一百石”。派许慎做县官，大概不合他的心意，所以许慎父子都不提及此事。许慎做县官，可能没有做到头就告病了。许冲在《表》里说，他父亲“教小黄门”时，《说文》一书尚未完成；“今慎已病，遣臣赍诣阙”（赍jī，持拿。“赍诣阙”，指拿着《说文》的定稿送至宫阙）。这说明《说文》的脱稿是在他告病还乡之后。许慎告病还乡，当是在洺县任内。

许冲的《表》写于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那时他的父亲还活着。大概此后不久，许慎就去世了。

许慎在京城的一段生活，对他的学术活动影响极大。

“从逵受古学”使他奠定了雄厚的学问基础；“校书东观”则使他有机会读到很多的皇家图书。在聆听名家传授和校阅古籍之中，许慎见多识广，“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在考稽古籍之中，他发现文字是诂训

“六艺群书”的根本，因而“又作《说文解字》十四篇”。许慎撰写《说文》，动笔在教“小黄门”之前，然而这教书的生涯也不能说对他的著述没有影响。因为教学活动，会使他考虑运用什么样的表述方式讲解文字，才便于人们学习。许慎的《说文》属于“小学”，也可作小学生的识字教科书。它在当时还是比较浅近通俗的。

许慎撰写《说文》，始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终于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总共花了二十一年的时间。《说文》是作者半生心血的结晶。

第二节 编写意图

关于《说文》的编写意图，许慎说道：

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本，则）知天下之至赜（同蹟，深奥）而不可乱也。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旨（同旨）。

（译文见附录二）

这段话告诉我们，他编撰《说文》的目的，是想恢复汉字的本来面貌，纠正解说文字中的谬误，使人们对汉字的形音义有一个正确的理解。进而运用作为“经艺之本”的汉字，诂训“六艺群书”，阐扬“五经之道”，为“王政”服务。许慎为什么要做这件工作，这又同主、客观的条件分不开。

西汉以来不仅出土了一些古代的彝器铭文，而且出土或从墙壁里挖掘了许多使用先秦六国文字写成的古代典籍。许慎解说汉字的形体，既有篆文、古文、籀文等文字资料可供分析，又有其他学者（“通人”）的研究成果可供“博采”。这就具备了客观条件。从主观上说，许慎的学术思想属于古文学派，他对当时出土的古代典籍深信不疑。可是这些书籍却遭到了今文学派的反对。他们认为“秦之隶书，为仓颉时书”，是自古就有的；而且这种文字是“父子相传”的，从古到今，没有变化。他们说，西汉以来出土的许多古书，是好事的人故意“诡更正文，乡壁虚造”（引文见《说文叙》。“乡壁虚造”意即假造古书，诡称从墙壁挖出）。反对古文书籍的人，压根儿否定了古代文字。许慎维护古文书籍，也得从维护古代文字做起。所以许慎著作《说文》的目的，实际上是要确立古代文字的历史地位，从而维护古文典籍。这里顺便说说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的情况。

秦始皇“焚烧经书，涤除旧典”，并颁行“挟书之律”，对民间挟带、私藏图书的人严加治罪。汉朝建国之后，“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汉书·艺文志》），对文化事业很重视。惠帝废“挟书律”，文帝征求旧典，武帝“罢黜诸家，独尊儒术”，并设置“五经博士”奖励儒者，这些都为两汉隆兴儒学做了开创性的奠基工作。在官府的倡导下，西汉以来不仅讲学、习文之风蔚为大观，而且自遭秦火零夷殆尽的古代典籍也陆续出现了。《汉书·艺文志》说：“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建馆藏书），置写

书之官”，上自“五经”，“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汉代的古籍有两种本子：一是今文，二是古文。今文本是汉代学者凭记忆、靠背诵，口耳相传，经本人记录或他人记录的传本。这些传本的字体，用的是汉朝通行的隶书，所以被当世人称之为今文。古文本则非汉人所书写。它们来自秦人私藏或为汉代人所发掘，是先秦学者使用当时六国文字写成的。这种文字对汉人说来是古文字。所以这些古本书籍被称为古文。汉代的今文书籍和古文书籍都不少。下文以重要典籍为例，说说这方面的情况，先说今文。

《尚书》：汉初传授《尚书》的著名学者是伏生（“生”在当时是敬称，意犹老先生）。他是前朝博士，在齐鲁间讲学。汉文帝派太常使晁错前往学习时，伏生已九十多岁。经伏生的女儿通传口授，晁错记录了他的《尚书》。

《诗经》：汉初传授《诗经》的名家有浮丘伯和毛公。浮丘伯把《诗》学传授给申培、辕固、韩婴。这三个人在再传之中又各成大家，申培作《鲁诗》，辕固作《齐诗》，韩婴作《韩诗》。毛公包括大毛公毛亨和小毛公毛萇。郑玄《诗谱》说，鲁人大毛公作《诗经训诂传》，河间献王得之，献给了朝廷；河间献王还立小毛公为博士。

《易经》：汉初传授《易》学的名家有田何，经过再传而至施雠（汉宣帝时人）。施雠作《施氏易》。《汉书·艺文志》说，宣帝时除《施氏易》之外，还有《孟氏》《梁丘氏》《京氏》等《易》学。

《礼记》：汉初传授《礼》学的名家有鲁人高堂生。高

堂生传给后苍，后苍又传给戴德、戴圣叔侄（宣帝时人）。戴德辑录八十五篇，世称《大戴礼记》。戴圣改订《大戴礼记》，定为四十九篇，世称《小戴礼记》。

《春秋》：汉初的传人不详。《汉书·艺文志》说：“及末世（指战国后期），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穀梁》立于学官。”可知汉代前期，传《春秋》之学的，只有《公羊传》《穀梁传》最通行，并在朝廷里设了博士。

《论语》：汉初流行的《论语》有《齐论》《鲁论》两种本子。传授《齐论》的名家有王阳等人，传授《鲁论》的名家有夏侯胜等人。宣帝时，安昌侯张禹兼收齐、鲁二家之长，作《张侯论》流行于世。

次说古文书籍。汉人记载古文典籍的出世经过有五处：

1. 北平侯张苍献古文《春秋左氏传》（即《左传》）。张苍做过秦朝的御史，归汉以后封北平侯，汉文帝时位至丞相。

2. 鲁恭王在汉武帝末年，因扩建私宅而拆毁孔子旧居，在墙壁里发现了《尚书》《春秋》《礼记》《论语》《孝经》等许多古文书籍。

3. 河间献王刘德（汉武帝的弟弟）爱好儒学，搜求古书。他得到的古文先秦旧书，有《周官》（即《周礼》）《尚书》《礼记》《孟子》《老子》等。

4. 鲁三老所献的《古孝经》。

5. 鲁淹中（里名）出土的《礼古经》。

古文典籍和今文典籍既然来历不同，当然存在差异。差异不仅表现在一为古本，一为今本，而且表现在小到词句，大到篇章，常有出入。比如伏生所传的今文《尚书》，只有二十九篇，而出自孔子壁中的古文《尚书》却有四十五篇。古文本和今文本存在差异，经过校刊、诂训，按说可以做到统一。可是古文本的出现，却遭到了一些俗儒的反对，造成了今古文两派的激烈斗争。斗争的原因，除了双方都认为自己握有真理之外，还有门户之见和待遇不公两个因素。汉人注重师法。今文典籍代代相传，人们对它的章句、诂训都一仍师承，形成了门户之见。一有门户之见，便不容异说了。所以反对古文典籍的人，并不尽是“俗儒鄙夫”，内中也有许多学者。而今文典籍又为朝廷所偏重，待遇不公，便更激起了古文学派的抗争。汉武帝设置“五经博士”，只有今文学，而无古文学。西汉末年，在古文学派刘歆等人的抗争之下，汉平帝曾一度增立古文经学博士。没过多久，光武皇帝又把它取消了。东汉巾叶，古文学派渐占上风，经学博士中才有了古文学派的大师（上文说过许慎就任过经学博士）。东汉巾叶以后，尊奉古文经学的大学者贾逵、马融、服虔、郑玄等人相继出现，有力地推动了古文经学的发展，并进而融合今文学，取得了绝对优势。

古文学派取得胜利，并不是偶然的。这个学派的巨大优点是尚详实，重考据，具有实事求是的学风。他们与今文学对立，但并不一概排斥它。他们很注意吸取今文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学术内容。比如许慎的《五经异义》，除叙

述古文经学的观点之外，还在对比中叙述今文经学的观点。他的《说文》也常常引证今文典籍。又如郑玄注《三礼》，杂糅两派的学术观点，是古文学家善于吸取今文学研究成果的典型例子。今文学家在治学方面，则缺乏求实精神和博采众长的大度。正如刘歆所指斥的那样，他们“抱残守缺”（《移书让太常博士》）。

在同今文学的斗争中，许慎的《说文解字》起过巨大的作用。它在当时的意义至少有以下三点：第一，《说文》阐述汉字的形体之源，确立了先秦文字的历史地位，使那些诬枉古本典籍为“诡更正文”“乡壁虚造”的人，露出了无知的本相。第二，《说文》论说汉字的原始，对经艺说来是正本清源，使那些惯用“巧说邪辞”臆断古书的人不能售其奸。这种人都属于今文学中的“俗儒”。第三，《说文》论说汉字的原始，给古文学派训释典籍提供了有力的武器，促进了古文学的昌盛。所以《说文》问世之后，立即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三节 持说立论的依据

黄侃说：“许君说字，皆有征信，经典之有征者，则征之经典；经典之无征者，更访之通人；其有心知其意，无可取征者，则宁从盖阙（宁愿空缺），以避不敏。”（黄焯先生《文字声韵学笔记》）许慎著书的态度十分严肃，持说立论都有依据。